

艾奇逊回忆录

艾奇逊回忆录

上册

[美] 迪安·艾奇逊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合译
伍 协 力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 者 的 话

迪安·艾奇逊(1893—1971年), 律师出身, 194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 任助理国务卿; 战后历任副国务卿、国务卿, 1953年退职, 以后曾充当美国各届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

艾奇逊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亲信, 他们两人都先后投靠摩根财团。艾奇逊所推行的“冷战”和侵略扩张政策, 反映了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妄想独霸全球的野心。在对苏关系上, 艾奇逊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 对抗和“遏制”苏联; 在欧洲问题上, 他主张加强欧洲联合, 重新武装西德, 建立统一的欧洲军事力量; 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 他竭力主张美国向这些地区侵略扩张, 控制中间地带, 取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 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书原名《创世亲历记: 我在国务院的年代》, 1969年在纽约出版。这里我们摘译了自1945年8月起至1953年作者退职时止的部分, 并略加删节。由于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均系作者的亲身经历, 对于研究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和对外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的观点是极端反动的。书中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和反动的唯心史观。例如，他在叙述美中关系时，蓄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耻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政策辩解。由他经手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他在叙述朝鲜战争经过时，耍弄反革命手腕，隐瞒和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1977年8月

目 录

一	新的职务和职责的扩大·····	1
二	马歇尔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 第一阶段·····	15
三	巴勒斯坦难题·····	28
四	欧洲的麻烦·····	50
五	马歇尔使团在华盛顿的代理人： 第二阶段·····	60
六	杜鲁门主义·····	75
七	危机在扩展：马歇尔计划的产生·····	90
八	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	108
九	一个多事的春天·····	119
十	北大西洋公约：一项公开达成的公开盟约·····	140
十一	盟国的对德政策·····	155
十二	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	162
十三	夏季带来了困难的决策·····	180
十四	国内外更多的会议·····	199
十五	对政策的重新估计·····	225
十六	欧洲和舒曼计划·····	236
十七	为欧洲建立均衡的集体部队·····	249
十八	朝鲜战争爆发·····	261

十九	朝鲜战争：第一次危机	279
二十	九月的意外事件	298
二十一	十月的冒险行程	313
二十二	“一次全新的战争”	324
二十三	令人沮丧的十二月	337
二十四	伊朗的双重骚乱	357
二十五	为稳定朝鲜战争作出的努力	379
二十六	麦克阿瑟将军的解职	394
二十七	走向朝鲜停战的一步	404
二十八	缔结对日和约	421
二十九	北约组织停滞不前	439
三十	埃及和中东司令部	459
三十一	北约组织理事会渥太华会议	470
三十二	“裁军大会”	480
三十三	北约组织在罗马集会	496
三十四	四国部长在伦敦开会	505
三十五	里斯本	517
三十六	再次遭到破坏	528
三十七	波恩和巴黎	542
三十八	朝鲜：挫败、骚动和叛乱	555
三十九	印度支那	565
四十	在伊朗的第二次尝试	577
四十一	一个公开的协议受到公开反对	589
四十二	换防	603

一 新的职务和职责的扩大

1945年8月27日，星期一，我宣誓就任副国务卿——在两届国务卿任内一直留任到1947年7月1日，为期六百七十二天。由于我的上级多次出差而且时常延期返任，为此我大约有三分之一多一点时间担任代理国务卿之职。由于正值国会休会期间，这个任命是一个“休会任命”，这意味着当国会复会时，这个提名将提交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使被任命者有机会为参议员们提供对他批评的根据。我很快就得到了这一机会。

原子能问题的开始

1945年9月18日内阁午餐会上，总统简要地谈了需要对原子能的国际谈判确定一个方针。9月21日，星期五，史汀生上校最后一次参加内阁会议。总统建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集中讨论史汀生上校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当时以及后来一直被误解了，部分是因为附件中有一封信提到“与俄国分享原子弹”，这句话引起了内阁中许多人的不安。但是，这份备忘录探讨一个范围小得多的问题，这就是应当研究同俄国人讨论由于我们发明了原子弹所引起的问题。关键性的几句话是：

这些关系可能会不可挽救地恶化，如果我们按照目前这种方针去和俄国解决原子弹问题。因为假使我们现在不能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仅仅继续不断和他们谈判，夸示我们有了这种武器，则他们对于我们的目的和动机将会增加猜疑和不信任。……

我强调应由美国提出建议对俄国采取这个行动，这或许比其他一切考虑都更为重要。英国支持它，但主要还是美国的建议。我认为，由任何国家集团（包括许多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显示自己潜力和责任的小国家）采取行动，将不会受到苏联人的认真看待。

这次讨论的情况与论题不相称。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机会作好思想准备。大家要求我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在史汀生上校的声明之后首先发言。我同意我们在得到英国的支持下应对苏联采取主动，然后再进入更大范围的讨论。我这样做部分由于对史汀生上校的敬意和尊重，同时也因为过去我国政府把所有的战后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进行错综复杂讨论之前，总是先在少数核心国家间取得一致意见。从租借法案的原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联合国宪章，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似乎是最起码的常识。

弗雷德·文森，汤姆·克拉克和克林顿·安德森反对史汀生上校的提案，部分理由是我们不应“分享原子弹”。上校并没有建议我们这样做。他所建议的只是同俄国讨论分享基本科学资料，不包括制造原子武器用的工艺过程方面的情报。讨论没有结果，但是有一条同事实不符，大意说是总统打算同别国分享原子弹的消息却泄

露给了报界，因而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总统同参议院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见。艾德礼首相极力主张与麦肯齐·金举行一次三方面的会议。提交给国会的咨文正在准备中。

上午，在内阁午餐会之前，我就原子能立法问题同总统举行了商谈。几个星期以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经理乔治·哈里森和在原子能问题上与史汀生上校合作的约翰·麦克洛伊曾力劝贝尔纳斯先生和我——因为我即将在他的暂离期间代行他的职务——同总统一起支持有关国内管制的梅—约翰逊法案。贝尔纳斯先生在启程前已经同意这点。但是，我已意识到，在国际管制方面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方针以前，假使政府在国内方面的立法走得太远，就会出现一系列复杂情况。我请赫伯特·马克斯就这个问题替我准备一份“谈话要点”，供我与总统会见时用（他在1944年我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工作时起就一直同我在一起）。我们都已看过史汀生上校的备忘录，所以马克斯起草的要点着重放在总统所希望得到的必要情报上，以便他能对这项建议和这项建议同着手国内立法的时间安排问题上，以及同议员们的协商和使国内和国际两个提案的内容协调一致上，都能确定自己的态度。在我们讨论后，总统要求提出一个国际方面的备忘录。

在这期间，参议员范登堡在国会进行工作，试图防止国会两院在原子能立法管辖权方面发生争论。他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参众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来做这件事。9月20日总统决定，他对国会提出的咨文既将涉及国内

管制，也涉及国际管制问题。他要我提出的有关国际管制各方面问题的备忘录，在 25 日递交给了他。这个备忘录深受史汀生上校文件的影响。它的结论是这样：对科学采取保密的政策是无效而危险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交换科学知识的方式和条件实行管理和国际控制，以避免走向一场导致互相毁灭的竞赛。它建议，在与英国协商之后，美国开始与苏联接触，试图制订一个规划，以互相交换科学情报和在发展原子能方面进行协作，此项规划必须逐步实施并在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弃这类武器的研制；以及到适当时刻把这个计划向其他各国公布。国会应充分了解这些会谈的情况，并与此同时考虑总统提出的有关国内管制方面的立法；以后如果这些会谈达成任何协议，国会则应徇总统之请采取国会行动。

总统在基本上同意这些建议后，要我和我的顾问塞缪尔·罗森曼法官会同五角大楼拟订咨文的草稿。我没有忘掉国务卿正在伦敦出差，我请本杰明·科恩通过电传打字机线路（一种可靠而秘密的电报装置）向他说明。10 月 1 日，我奉命通过哈利法克斯爵士也通知了英国政府。总统征求了雷伯恩议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克利的意见后，确信加上国际管制方面的建议会对于咨文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咨文本身在陈述了备忘录提出的需要国际协作的理由后，建议“首先同我们一起搞发明的伙伴英国和加拿大讨论，然后同其他国家会谈，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内用合作代替敌对的协议”。

有了如此细致准备的咨文，我希望在较大范围内举行更正式的会议之前，同英国和苏联会谈的道路已经畅

通无阻。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务卿贝尔纳斯从伦敦回来
后，满怀着对莫洛托夫阻挠策略的痛苦回忆。他已没有
胃口再和俄国人谈另一个棘手问题了；他的同事罗伯特·
帕特森和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两位部长也完全抱有同样的
态度。一个月以后在与艾德礼和麦肯齐·金会谈原子
能管制问题时(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谈)，我们同意采取史
汀生上校所明确不赞成的方针——在有较多国家参加的
范围内开始进行国际会谈，包括许多没有显示过力量和
没有表示过愿意承担责任的小国。但我怀疑如果作出相
反的决定是否会改变它的后果。证据现在很明显——包
括苏联正在急切搜罗德国的核科学家和导弹专家——即
可能在当时，以及肯定在极短时间以后，斯大林已把发展
核武器放在首要地位。即使在对方方法和手段实行全面管
制的条件下，看来史汀生上校也很不可能说服斯大林放
弃在苏联建立核武装体系。

和参议员们的小冲突

当我接到副国务卿的任命时，盟国驻东京最高统
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给我一个热情的贺电，并邀请我
亲自去观察日本的局势。我答复时表示感谢，希望能够
去。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副国务卿们忙于内部事务，不能
出国，看上去很少有可能这样做。

9月17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驻日本的占领军在六
个月内将减少到二十万人。18日，新闻记者询问这件事，
总统说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和他商量过。他很高兴知道这

位将军并不需要象当初他估计那样多的军队。三十天之前驻军数字是五十万人，以后减少到四十万，现在又削减一半。

第二天，9月19日，有人问我是否对将军的声明有所不安以及对于占领一事有何意见。我说，需要多少军队纯粹是一个军事问题，国务院不便过问。然后我又说了一些话，并且同意直接引用这些话：

重要的事情是对日政策同本政府一直在奉行的以及据我所知——而且我认为确实知道——现在仍在奉行的政策相同。在实施这项政策方面，占领军是政策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这项政策现在是，过去也是：日本的投降必须实现；日本将处于不能重新发动侵略战争的地位；造成战争狂的日本的现行经济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使这种战争狂不能继续下去；以及为实现这项政策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要采取什么措施。

同一天总统把对我提名的建议送交参议院。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和肯塔基州的A·B·钱德勒对这提名案采取拖延行动。惠里坚持说我“损毁”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誉，而钱德勒说我侮辱了将军。惠里向我提出有关对日政策和职权的一长串问题，包括我自己对这两者的看法。我以有关文件作了答复。白宫发表了“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初步政策”以及说明麦克阿瑟将军的职权的一份声明。

这样，在星期一，即9月24日，参议院准备好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为批准我的任命而安排的，但实

实际上是讨论麦克阿瑟将军的地位和职权同美国总统的地位和职权的关系。这场辩论是怒气冲冲和激烈的。参议员塔夫脱说他打算投票反对参议员惠里重新提名的动议，因为他认为我有资格担任副国务卿。由于他认为决定美国政策的是总统而不是副国务卿，因此，他认为“不同意艾奇逊先生在所谓与麦克阿瑟将军的争议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并不构成拒绝批准这项提名的任何理由”——虽然他在这以前说过我在记者招待会所说的那段话是“我所听到过的有关政策问题的最不平凡的声明之一”。参议员巴克利和康纳利坚决为我辩护。在对重行提名的动议中，参议员惠里得到十一位参议员的支持。唱名表决结果，六十九票赞成批准，参议员惠里一票反对。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将来，我们本来是可以意识到这场小争论是导致1951年4月11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统帅职务斗争的开端。

工作的堆积

尽管有这场既浪费时间又荒唐无稽的风波，我“代理”贝尔纳斯先生的五个星期还是建设性的几周。9月13日同英国的财政谈判开始了，以便寻求一种代替租借法案的办法。我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这次谈判中参与了决议的制订工作。就双方代表团的会议来说，我满足于支持威尔·克莱顿，他替国务院挑的工作担子最重。我由于在一年前已代表政府进行过类似的谈判，因此我觉得对于要做的工作是熟悉的。

在这时候，国务院获得了新的机构来履行它扩大了的任务。8月底，总统把军事情报局的外事工作、设备和人员移交给我们；到9月中旬，威廉·本顿前来主持把它们合并到国务院。月底前，战略情报局的研究与分析组和报表组也并给我们。艾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上校被任命为负责研究和情报事务的国务卿特别助理。国务院错过了这几次机会。后者，也就是研究与情报工作，由于十分愚蠢的行动，几乎立即垮台。所以，当1947年建议设立中央情报局时（作为武装部队统一法案的一个部分），国务院不仅在这个领域放弃了领导权，而且也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新闻宣传的运气较好，它由几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助理国务卿认真地照管。但是，这些工作最后也不得不遭到国务院曾获得成功的许多业务机构的同一命运，包括经济战、租借法案、对外援助以及技术援助。

在所有这些场合，国务院要末是没有足够的远见看到它的机会，或缺乏行政上的能力来抓住这些机会；要末工作陷入文牍主义为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所窒息，要末由于同国会中的反对派冲突而耗尽了整个国务院的精力。当时，新的职能按照证券市场的行话来说好象是“被母公司遗弃的子公司”一样，不得不在没有政策指导的情况下，进行一种没有生气的管理工作，如同从波拿巴到戴高乐时期之间的法国官僚机构一样。大约在同一时刻，我们又接受了清理一个有问题的单位——对外经济管理局一部分财产的任务。谁也没有为它的撤销而悲伤。

9月24日那个星期，国务院和伊克斯部长了结了我在一段时期以来所做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石油方面的

国际协定；另一件是大陆架地下和海床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邻近我国海岸的渔业资源保护。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国务院和内政部成功地进行合作是个不小的胜利。同英国签订的石油协议为共同发起和准备一个“国际〔石油〕协议奠定了基础，协议将包括所有对石油贸易有兴趣的国家，不论是生产国或消费国”，其目的是为了所有参加国的利益而井然有序地发展这项贸易。中东即将发生麻烦的迹象已很明显。许多互相冲突的利益需要调和，包括产油公司和生产国政府之间；生产地区——象波斯湾，东印度群岛以及南美洲——和美国之间；有秩序地开发（包括资源保护）与无限制的竞争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可惜我们所作的工作太少，为时太晚。这些努力一无结果并被淹没在欧洲经济危机、中东的民族主义和国有化的动乱以及冷战的狂热之中。假使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要得到合理的利用，达成这类协议是必不可少的。

在保护资源方面，我们是成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力所能及的，因而能较迅速地采取行动。在一些部呈交给总统的宣言中，总统特别指明上述有关水域的性质是“公海”以及这些公海的自由和无阻碍的航行权不应受任何法规的约束。在开发地下资源以及已经或者可能由美国人单独经营的渔业方面，美国将设立保护区，以管理和控制钻探及捕捞。至于已经或可能同其他国家的商业集团联合经营的渔业，其管理和控制办法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决定。我感到很荣幸，作为代理国务卿，我副署

了总统签署的这些宣言，这是孜孜不倦工作的成果。

最后，总统在10月3日给国会的咨文中，又开始了另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即建成圣劳伦斯河的航道和水力开发，并要求国会制订必要的立法。我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准备工作，想推动立法的制定，但是毫无效果。有关的势力集团（铁路、劳工、大西洋港口）还非常强大，他们担心来自大湖区港口的竞争。斗争继续了将近十年，一直到1954年5月13日——在我们离职后一年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

一次最高级的原子能会议

1945年11月10日到16日在华盛顿是繁忙的时刻。英国的艾德礼首相和加拿大的麦肯齐·金已经到达，同杜鲁门总统讨论原子能的国际方面问题。这些讨论是在极小范围内秘密进行的，我没有参加。在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我的老友本·科恩和万尼瓦尔·布什同贝尔纳斯先生一起干这件工作。据我回忆，为了保密，决定性的谈判是在海军部长的游艇“塞科雅号”上举行的。即使谈判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已完全忘掉了。

会议于11月15日结束，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赞成“科学研究成果”可供利用和自由交换，但不包括“有关原子能在工业上实际应用的详细情报”或者它的“军事上的利用”。他们宣称，这应当有待于“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有效的、互惠的、切实可行的安全保证。……应在联合国组织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制订各项

建议并提交给联合国”；它的工作“应分成几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工作的胜利完成将增进全世界在下一阶段工作开始前所必需的信心。”这样，一连串的漏洞和压力以及对这些漏洞和压力的反应，使政府处于和史汀生上校对立的地位。但史汀生上校是正确的。虽然我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点，命运却注定我将成为证明史汀生上校观点的主要人证之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英国贷款

那时威尔·克莱顿和我忙于盟军的供应和财政问题。11月13日，总统要求国会提供十三亿三千多万美元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第二年度费用中我们应付的份额。克莱顿和我负责代表政府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国会严格控制行政部门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于诸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外和租借法案等等活动的拨款，每次只批准一年。由于未经法律批准的拨款不符合议事规则，因此，为了使每项活动得以继续进行，每年必须通过两项法案，这就需要在四个不同委员会里举行四次听证会。两院实质性的委员会，如外交委员会，必须批准每笔拨款；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必须建议拨款的数额。对于这种议事程序，要由宾夕法尼亚大街尽头^①的人们来评论；不外乎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防止政府部门铺张浪费的必要保证，一种认为这是国会滥用职权和故意

^①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一头为白宫，一头为美国国会。——译者